

女真

统治下的儒学传承

——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

杨珩／著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2XJC770007) 成果



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2XJC770007）成果

女真

统治下的儒学传承

——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

杨 珩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舒 星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 /
杨珩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14-7671-0

I. ①女… II. ①杨…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金
代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4409 号

书名 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
——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

著 者	杨 珩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671-0
印 刷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875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 ——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序

李文泽

北宋灭亡以后，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由女真族统治的北方帝国——金。它与南方的赵宋王朝相对峙，军事上的争战连年不断。在经历了一百二十年的政治统治后，金又被蒙古大军所横扫，消亡于蒙古铁骑之下，走完了一个政权由兴盛而衰亡的历史轮回。

• 1 •

遗憾的是，金代是当代人最不知晓的时代之一。对一般人而言，与金代相关的历史几乎是空白，人们所知道的金代人物、故事，往往是从各种小说中获取的，例如：金军元帅四太子金兀术，愚蠢凶残，其统率的金国大军横扫江南，却在与南宋岳飞的军队交锋中屡屡落败于岳家军。这一形象的塑造来自清人小说《说岳全传》，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历史哈哈镜式的文学描写，出于对民族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作者将大量的民族情感融汇于小说之中。金代还有以“牛鼻子道人”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七子”，他们个个身怀武艺，整日为恢宏宗教而辛劳奔波，为人处世却显得有点木讷，往往成为武功强人（如郭靖等）的引导者。这些形象源于新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系列小说。至于谈及其他的金代史迹、功业成就，一般人则大多茫然不知，即使是一些专门从事史学、文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容易视这一段历史为空缺，很少做深入的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金代历史研究的这一缺失逐渐有所破壁，一些学人开始对金代历史、学术、文化诸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辛勤耕耘，填补了许多前人对这一时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空白与不足，筚路蓝缕，其学术研究的开创之功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呈现给我们的新著——杨珩博士的《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一书，也是对金代学术史进一步探讨的拓展之著，是著者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数年所获得的成果。

讨论中国儒学，大家首先想到的多为先秦、两汉、唐宋、清代的儒学发展，关注这些时代所产生的重要人物及其著述，而对其余时代则往往有所忽略。诚然，上述这些时代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确实成就斐然，然而在其他历史时代，中国儒学的发展脉络也是清晰可见，不可或缺的，尽管其间水平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可以这样讲，没有其他时代的积淀，就很难有汉学、宋学、清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儒学的巨大成就，只有“红花”与“绿叶”交相扶持，才更显示儒学发展的风采。

仅就我们讨论的金代儒学而言，传统儒学能在 12 世纪的中国延续不断，金儒功不可没，正如本书所言“金代儒学在整个儒学思想发展史上虽然谈不上特别辉煌，但确实承担了传承北方学术文化的重任”，“完成了北方学术上承于宋，下启于元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与南方儒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引文见该书“绪论”），使金代儒学成为儒学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页，只是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犹如雾里看花，不甚真切而已。因此讨论金代儒学学术的实绩，正确评价金代儒学的辉煌成就，乃是杨珩新书的核心内容。本书著者给出了若干重要的命题及解答：金代的儒学诞生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金代社会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何种强有力的支撑？金代儒学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学术繁衍过程，产生了哪些名家、名著？金代儒学与其他宗教，如释、道二教在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共存共生？这一系列命题，我们都能从杨珩的新著中一一寻找到答案，获得合理的诠释。就本书所传达的信息而言，全面解读金代儒学的历史发展、历史地位，是本书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作为史学（包括学术史）研究的学术论著，文献是其讨论问题的基石，没有历史文献的支撑，任何结论不管其多么雄辩，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足令人信服。而做文献研究，最大的困难是对文献史料的驾驭，研究者所面临的史料文献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状况：要么是文献数量过繁，汗牛充栋；要么是文献数量过略，寥若晨星。金代儒学文献的存世情况显然属于后者，记载金代儒学的文献不说整部的著作数量极少，屈指可数，即使是单篇的文献数量也相当有限。本书所载的史料，一点一滴都是著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辛勤爬梳而得，“成如容易却艰辛”，其间的辛劳，著者自有感受，读者也当能从其征引的宏博中体会到。书中，作者并不刻意宣扬“新奇”的见解，或建立什么宏纲大论，只是运用一些实实在在的史料文献，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些问题，寻求真真切切的答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学术风范。我相信，读过这本新著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认同。

读杨珩博士的新著，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其观察问题周密全面，立论不偏不颇，分析透辟入微，而行文细针密缕，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大开大阖的气势，却于朴实中显出灵秀。这可能是与著者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的性格有关，形成了一种自成的学术范儿。

我认识杨珩已有数年之久，她聪敏勤奋，博学覃思，在学术上多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对她的求学历程也颇有所知，她经历了一条较为曲折的求学之路，曾经就学于一些与今天的研究迥然有别的专业类别，现在着力从事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可

说是攀登不息，学无止境，“疲惫”二字似乎已与她绝缘，其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十分令人钦佩。这本书也是她精雕细琢的精品，曾经三易其稿，字斟句酌，洋洋洒洒 20 多万字，尽管其中还带有几分学术的稚拙，但其成绩已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人生的学术追求如登高山，正像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杨珩博士勇敢、勤奋地努力着，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部学术著述。我们期待，她能更加奋进不止，向着自己心中的高峰冲刺，圆自己学术的追梦之旅。我们热切地期盼着！

2014 年 1 月于北京塔院消夏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金代儒学发展的背景	(26)
第一节 金代历史发展概况	(27)
第二节 金代的文治政策	(31)
第三节 金代儒学的远祖近宗	(59)
第四节 辽、宋、西夏和金代的佛、道二教	(68)
第二章 “借才异代”时期的儒学	(89)
第一节 “异代儒士”的来源	(90)
第二节 辽、宋儒士的政绩	(95)
第三节 “借才异代”时期的儒学文献概况	(100)
第四节 “借才异代”时期儒学文献的特点	(106)
第三章 制度化时期的儒学	(112)
第一节 “文治”政策下的儒学文化繁荣	(113)
第二节 制度化时期儒学文献概况	(119)
第三节 传世儒论单篇文献的思想倾向	(133)
第四节 制度化时期的儒学文献特点	(141)
第四章 学术化时期的儒学	(145)
第一节 国势衰微与学术高潮	(147)
第二节 赵秉文及其儒学著述	(150)
第三节 王若虚及其儒学文献	(164)
第四节 李纯甫及其《鸣道集说》	(181)

第五节 本时期其他作者及儒学文献·····	(206)
第五章 金末遗儒与儒学传承·····	(218)
第六章 金代儒学的时代特色	
——从现代学术视角进行的审视·····	(228)
第一节 金代儒学的“拿来主义”	
——兼论金儒对传统儒学文化的继承·····	(228)
第二节 兼收并蓄的金代礼制	
——以《大金集礼》为例·····	(241)
第三节 三教合一的凸显：兼论金代儒学与佛、道关系	
·····	(254)
第四节 儒学文化在金地域内的传播	
——兼论儒学文化的北传·····	(263)
第五节 儒学教化在女真部族中的推广	
——以金代汉文文献的翻译为例·····	(277)
第六节 金代儒学与其他学术文化的积极互动·····	(289)
结 语·····	(306)
附录一 金代儒学文献考录·····	(313)
附录二 近三十年来金代儒学相关学术研究信息·····	(323)
后 记·····	(337)

绪 论

一

公元 1115 年至 1234 年间，女真统治者雄踞中原，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崇儒重道，以儒治国，不仅借辽、北宋儒士创立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还培养出大批本土儒学人才，推动了有金一代儒学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对金代儒学的研究较为薄弱，不仅缺少对儒学文献的专项梳理，其思想内容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虽然这一时期的儒学无法与南宋儒学相提并论，但它确实完成了北方学术上承宋、下启元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与南方儒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 1 •

“文化传统依文献承继，虽百世而不绝，此正为孔子的期待。”^①从文献学角度来看，研究金代儒学文献本身，正是对金统治前后 120 年内儒学文献的目录、类别、版本、流传、存佚、校勘等情况做系统考察和梳理的过程。这是一项力臻回归历史本来面貌的工作，我们失去它，便没有话语权，只能人云亦云。历史学以确定客观实在为首要目的，而确定客观实在离不开对文献本身的考察。老一辈历史文献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研究精神让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也落到金代儒学文献上来，为未来更加系统地进行思想史、学术史、史学理论、史学评

① 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论等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儒学史角度来看，金代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无法与秦汉、唐宋、明清儒学相媲美，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显得异常薄弱。对比汉、宋，有金一代的儒学发展的确衰微，无论是从儒学思想的创新、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流派的影响力抑或是从官修、私修的儒学文献本身来审视，都颇为逊色。一些思想、文化史学者甚至认为，金源统治下的一百余年中，中原地区的儒学思想由于失去了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在急剧衰落中走向泯灭无闻。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金代儒学并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仍然扮演了某种角色，使中国北方的儒学思想得以传承，甚至在某些地方带有更加鲜明的特色。因此金代儒学的研究价值正在于它还不被学术界所重视，在于它自身研究的薄弱，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金代儒学文献研究亦可以诠释为 12 至 13 世纪女真民族统治地域内的儒学文献研究。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女真民族统治较之文化上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其中，儒学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学术研究带有浓厚的民族特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重视对本国历史上的民族人群进行研究。比如古埃及中的埃及人、亚洲人、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雅典的著名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希腊史》一书中，有关于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等族人民的记述；古罗马独裁者 G. J 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帝国史学家 C.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两书中，也存在大量关于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记载。那么，我们有必要为女真这个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在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后来的满族亦即金的后裔），找回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那段记忆，使民族的东西真正成为国家的、世界的东西。这应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课题。

关于金代儒学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几点引人深思。

首先，金代儒学思想当中所突现的“尚中意识”值得现在学习和借鉴。“尚中意识”是指金儒比较崇尚儒学思想里的中庸思想。“中庸”本是儒家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孔子于《论语·雍也》中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子思作《中庸》，魏晋时期，何晏集解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后来宋儒又继续从诚、性、中、和四个方面对中庸进行深入阐释，赋予其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总的说来，中庸思想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指一种方法论，一种调和折中的处世态度；第二，是其拥有“德”这样高尚的思想情操；第三，拥有丰富的本体论内涵。金儒非常崇尚中庸思想，金初时期的儒士们就对《礼记》中的《中庸》一篇颇感兴趣。至金中后期，赵秉文著《中庸解》一书（已佚），及《中说》《庸说》《诚说》《和说》四篇，李纯甫也曾著《中庸集解》（已佚）一卷。现在看来，中庸思想可以作为一种常行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可以作为提高个人道德情操的一个衡量标准，更可以成为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理想对象之一。

第二，金代儒学文献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三教合一精神。由于佛教、道教和儒学思想对金代上层社会及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不断深入，金统治者在以儒为宗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使出了双刃剑。金朝的儒、释、道三家在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得以交叉影响并共同发展。而今，中国不再仅有佛、道二教，还有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传统宗教及信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和途径更加多样化。人们所吸收的错综复杂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势必会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之间形成交流，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我们需要端正对待宗教的态度，借鉴前朝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去驾驭他们。

第三，女真民族统治下的契丹、渤海、汉族等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求同存异，正符合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众所周知，“求同存异”是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外交方针。而这项方针对于当今时代下的中华民族来说，仍然适用。金统治地域内的东北、中原、陕西、甘肃一带聚集了许多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的民族。其中，汉族在农耕经济的支撑下，文化发展较为先进。女真民族作为统治阶级，不仅吸收和借鉴中原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以儒治国，而且竭力保存一些女真民族自身的东西。这样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所谓和谐，并非是完全一致，相反，它应该更加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的差异总会存在，但共同追求各个领域内文化的发展才是大势所趋。女真民族不仅创造了女真文字，而且学习汉族文化，翻译汉文儒学文献，这些行为正是不同民族间在文化上求同存异的表现，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二

我国学术界对金代儒学文献及思想的研究仍然薄弱，甚至与同样处于分裂状况下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相比也差之甚远。在中国儒学史或学术史一类文献中，作者往往落笔于宋、元，对辽、西夏、金的儒学文献及其思想言之寥寥。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言及金代儒学仅用了一卷的篇幅，将李屏山及其源流放到文章最后做点缀，认为北方儒学是杂以道教和佛教禅宗的“王苏（王安石及苏轼）余派”^①，是不入正宗的旁门外道。庞朴在《中国儒学》中，仅用630个字对金代儒学做简要归纳。他认为“女真族素来具有崇尚汉文化的精神传统，因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100《屏山鸣道集说略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6页。

而建国之后便相当自然地尊信儒家学说，并自觉地以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统治学说。这主要表现在：1. 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和使用……2. 实行科举制度以选聘人才。”^① 韩钟文在《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将辽、西夏、金、元儒学合为一章来论述，他认为：“金、元之际，在佛教、道教以及李纯甫等‘三教归一’的思想流行于北方之时，濂、洛、关、闽之学未被引起重视，程氏洛学几乎成了绝响，由于北南疆域之阻隔，盛行于南方的诸子学到金贞祐南迁之后才为北人略知一二。”^② 难怪 2009 年，王德朋在《近二十年来金代儒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迄今出版的中国儒学史著作，特别是两宋时期中国儒学史著作，几乎都未把金代儒学纳入研究范围，客观上已经把金代儒学排除于中国儒学史研究之外。”^③

这种轻视金代儒学研究的状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所改观。80 年代东梁先生《李纯甫的“三教合一”论》一文，属于国内第一篇研究金代儒学的学术论文。^④

近 20 年来，关于金代儒学、史学、文学、宗教学方面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1995 年魏崇武的《金代儒学发展略谈》，2000 年魏崇武的《金代理学发展初探》，2004 年晏选军的《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2005 年杨忠谦的《论金代儒学的传播》，2008 年刘达科的《金代儒学与文学》等都是直击金代儒学的专题学术论文。2008 年 6 月吉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刘辉发表国内首篇研究金代儒学的博士论文《金代儒学研究》，并于 2008 年至 2012 年相继发表《金代儒学研究现状述评》《金代儒学发展脉络缕析》《赵秉文理学研究略论》《洛学在金代的流传与影响》《王

① 庞朴：《中国儒学》第 1 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第 278 页。

② 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00 页。

③ 王德朋：《近二十年来金代儒学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 年第 1 期。

④ 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 年 3、4 期合刊。

若虚的经学思想研究》等文，大大地推动了金代儒学研究的进程。2011年6月，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东旭在其所著宋元部分将金代儒学与元代儒学合为金元部分来进行梳理，体现了金代儒学开启元代儒学的历史关系，并将“金代儒学述略”作为专门一章，集中论述赵秉文和李纯甫的儒学思想，对比2008年以前的儒学史类著述而言，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当然，近些年与金代儒学相关联的文学、史学、宗教学等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也有可喜的成果。例如杨忠谦致力于从家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论金代家族的文献积累与文化教育》，2012年他又发表《科举文化视野下的金代家族与文学》一文；郭秀琦从女真皇族的角度研究儒学文化，2012年发表《金代皇帝的儒学阅读》；赵忠敏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北方儒学，发表了《论金末元初北方儒学复兴——以山东东平地区为例》。总的看来，金代文学、宗教学研究是走在了儒学与史学研究的前面。由于金代儒学文献存世较少，相关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金代儒学研究本身来说是非常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关于金代儒学研究的内容，学术界有以下几个研究倾向：

首先，关注金代儒学发展分期。

研究金代儒学发展分期其实是了解金代儒学发展起承转合，抓住金代儒学文化发展脉络，对其价值及地位进行客观评价的前提。2001年孟古托力在《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中指出：“根据金朝儒家文化发展的情况，分为三个时期。一、太祖建国至熙宗天眷末。该政权逐渐理解知儒、用儒、重儒的深远意义，并实践之。二、熙宗皇统初至章宗承安末。熙宗遵循‘武功既定，文治勃兴’的程序，完成‘皇统转治’，并制定‘崇儒重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儒家的道统，而非道教）基本国策。三、章宗泰和初至金亡。金政权腐败，蒙

金战争愈演愈烈，于是出现武治与文治并行现象。”刘辉的博士论文及其《金代儒学发展脉络缕析》一文中将金代儒学发展分为“借才异代”、“制度化”、“学术化”三个时期。

他们均将金代儒学发展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只是在初期至中期的时间点上有些差异。刘辉认为“借才异代”应该只包含金太祖、太宗时期，而孟古托力则认为应该为金太祖至金熙宗天眷末。我们很赞赏刘辉对金代儒学三个阶段的称法，它们分别概括了金代儒学发展三个时期的特点，突出了儒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体现的特殊作用。但在“借才异代”与“制度化”这两个时期的交接点上，我们更倾向于孟古托力的分法。金初著名异代学者韩昉，在金太宗时期因出使高丽有功，而后被加为翰林直学士，他入礼部任职是在金熙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同样，原北宋大臣宇文虚中，儒学造诣精深，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即金太宗天会时期）应诏使金，后被金软禁，获释后仕金并与韩昉同掌词命，到金熙宗天眷间（1138—1140年），才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南郡国公，后又因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韩昉、宇文虚中真正仕金，是在金熙宗天会、天眷年间。如果将金初儒学分期划至金太宗末而不包含金熙宗时期，那么无法代表金初“借才异代”这样一种历史局面。金太祖、太宗完成了对辽、宋疆土、图籍以及人才的大量掠夺，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真正为金廷效力，是在金熙宗时期。

因此，我们更认同孟古托力对金朝儒家文化的分期方案，本书也采用相同的分期方法。

其二，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的个案研究成为热点，但有所侧重。

赵秉文、王若虚和李纯甫是金代比较突出的儒学代表人物，他们保存下来的儒学文献相对较多，便于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故而赢得了诸多研究者的青睐，成为金儒研究的热门话题。

对赵秉文儒学文献内容、思想、价值的评价，学术界有几种声音：

第一是对赵秉文的学术地位及儒学造诣表示全面认可。张博泉承认赵秉文是继北宋“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之后，金朝儒学复兴的“金士巨擘”之一。^①宋德金称他“代表了金代儒学发展所达到的最高水平”^②。赵秉文作为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儒学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在金朝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③，韩钟文称其为“金朝思想界的宗主”^④。

第二是认为赵秉文的儒学思想秉承道统。吴凤霞认为赵秉文的儒学思想源于韩愈与二程的理学，“他一生‘志于道’的努力，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北移，使金代许多士人归于儒学正宗”^⑤。魏崇武也认为“赵秉文的思想明显受到周程理学的影响，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兴趣”^⑥。庞朴说“他毕生提倡儒学，自称‘韩愈第二’，精研儒家经典，其学较为纯正，故被誉为‘儒之正理之主’……他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二程的理学和韩愈的道统学说”^⑦。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赵秉文“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学”^⑧。夏宇旭认为赵氏的天道性命观源于韩愈，承于周程之学。^⑨

第三是认为赵氏儒学中带有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由赵吉惠

① 张博泉：《赵秉文及其思想》，《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3期。

② 宋德金：《金代儒学述略》，载徐振清主编《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国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③ 庞朴：《中国儒学》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79页。

④ 韩钟文：《中国儒学·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2页。

⑤ 吴凤霞：《金士巨擘——赵秉文》，《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

⑥ 魏崇武：《金代儒学发展略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⑦ 庞朴：《中国儒学》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79页。

⑧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71页。

⑨ 夏宇旭：《赵秉文的天道性命观》，《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